



风雨柿子岭

杨润身

风雨柿子岭

杨润身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以冀南某山区为背景，以柿子岭村田二牛一家的离合悲欢为线索，真实地描写了抗日战争前后广大劳动人民所受的深重苦难，歌颂了工农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地主恶霸、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作品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，以抗日儿童团团长田翠巴的口气、心理、所见所闻，铺陈故事，描写风物。故事曲折动人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质朴醇厚，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，特别适宜于广大青少年阅读。

风 雨 柿 子 岭

杨 润 身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 5/8印张 2插图 242,000字 印数：1—43,100 1982年4月第1版

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2 定价：0.92元

—

一九三四年农历九月初一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把我推醒，要带我去打井。从我记事都是母亲喊我起床，因而养成一个习惯，睁开眼先喊一声娘。我睁开眼不见母亲在屋，紧问父亲：“娘呢？”

“你娘往你李奶奶家借香和烧纸去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今儿个是动土吉日，跟我打井去。”

父亲为啥要打井呢？提起来话就长了。

我们家一共四口人：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我。父亲三十五岁，母亲三十七岁，哥哥十五岁，我十二岁。家里耕种着十一亩田地，八亩地是本村地主刘老春家的，只有三亩地是爷爷奶奶给留下的。三亩地全是沙多土少的旱地，一年收不下几斗粮食。我不知道刘老春家的地租是多少，可我知道，地里收下的粮食家中落不到什么，好年头能进家石二八斗的；坏年头进家的只有黑枣、柿子、糠菜和秕谷，这些东西是我们家最好的食粮。

本来我父亲人勤手巧，除了种地以外，还可以当当石匠或是做做木匠活儿，挣几个钱买些粮食吃。不想近二年来，世道变得特快，一到了春天冬天，山东成群的木匠，元氏县

和赞皇县成伙的石匠涌到我们这地方来，就把我父亲的活儿给顶了。他们都是逃荒过来的，要的工钱非常低，一天五个铜钱算是最高的了。有时雇主只管一顿饱饭，就可以获得他们的全部血汗。

我父亲不能做石匠木匠活儿，便一心在地土上打算盘。因而他想在自己的那三亩地上打一眼水井，把旱地变成水地，多打一些粮食，过年过节也想吃顿白面饺子。可是打水井，不象在山里开片荒地那么容易，是件抽筋剥皮的事情，要花好多好多的钱。八月十五日晚上，我父亲求了个保人，一同去找刘老春借了三百吊铜钱，言明利息四分。

我父亲原本是不大迷信的，我八岁上的时候，一个本家的爷爷劝他加入“先天道”，说加入“先天道”下世可以享荣华得富贵。我父亲唉一声说：“这辈子能抓弄到一碗饭吃，下世喝西北风也不去管他了。”没有加入。去年后街我本家二大伯家打井，打成了又塌了，落了个家败人亡。一个阴阳先生说二大伯鼻子尖耳朵小没有打井的命相；又说他动土那天是个“黑道日”，得罪了土神……。我父亲的鼻子更尖，耳朵垂更小，因此他有几分害怕，不得不求了老秀才给查了《玉匣记》，选了个动土吉日来免免灾，同时还叫我去破土。

为什么叫我去破土呢？这也有个原因：我七岁那年冬天，村上来了一个拉骆驼的相面先生，我父亲去给相面先生的骆驼送了一筐草，把我推到相面先生跟前说：“你给看看我这个儿子有没有点儿命相。”相面先生细看了一下我的脸，闭上了两眼，拉长了声调儿回答说：“是个有命的呀！方脸大耳，脑鬓上明明显显地摆着一根棍呀！”我父亲摇了摇头说：

“唉！是摆着根放羊鞭杆吧？”相面先生说：“不是呀！是根七寸长的带毛儿的棍棍呀！”我父亲相信了相面先生的话，他认为我比他有命。我也算沾了那一筐草的光。到了冬天，父亲把我送到老秀才成立的私塾里去念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这里的学费很便宜，念一冬天书，只给老秀才送十捆白草软柴就行了。我念书心灵记得快，老秀才也向我父亲夸我是个有文才的孩子，我父亲更信了相面先生的话了。

不光我父亲信我有命，我奶奶更说我是个有命的。生我的时候，因为家里穷，我一生下来，父亲就把我放到水罐里，要把我淹死；而奶奶把我救出来了。父亲还是坚持要把我弄死，要不就送人。奶奶也没有了主意，便去找了阴阳先生，让阴阳先生算算我的命相好不好，要好就留下来。阴阳先生算了算，告诉我奶奶，说我是个水命人，而且是大海水；又说我一生下来就见了水，是再有命不过了。我奶奶说服了我的父亲，这才把我留下来。

我穿好衣裳下了炕，父亲叫我洗脸擦手。母亲借来了香和黄色的烧纸。母亲的脸上还显露出笑容。

母亲脸上显露出笑容可让我稀罕。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不知道，后来从邻居奶奶、大娘们口里知道了。母亲原本是黄河西边陕西省的老家，她十四岁上的时候，陕西省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旱灾，场里的石碾没有翻身，她跟她的父母逃荒要饭到了山西。她父母把她卖给了人贩子，自己后来也病饿而死了。后来，母亲一连被卖三处，三处都没有过成人家。父亲花了不多几个钱买下了母亲。刘老春家的人们放出风声，说

母亲走一处妨一处，是个“妨人精”。又说母亲颧骨高，头发弯，头顶上长着一对漩，天生一个“扫帚星”。刘老春家办喜事，盖新房，不准母亲在他家门前路过。逢年过节，母亲往爷爷庙里去敬香，管庙的香头也不愿让母亲到庙里去。

母亲脾气很倔强。不论谁要小看她，她都气个脸红脖子粗。可她骂不吵，总是把气火憋在心坎里。很难见到她脸上有笑容。因此，一个邻居婶婶说过：“看见瞎子睁开眼，也甭想能看见翠儿娘欢喜了。”今天，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叫我特别地高兴。又叫我不由己地想起父亲说的一句话：“只要在咱的地上打成一眼井，咱的日子就好过了！”

我洗罢脸擦完手，母亲给我找了一件干净褂子，给我穿上，又把褂子上的两个线头捏掉，才把她借来的香和烧纸放在我手里，让我跟着父亲和哥哥去打井。

我跟着父亲走出了村东口，微风将路上的几片干驴粪吹了起来，父亲细心地把它铲到随身带着的粪筐里。我家的三亩地离柏树老坟不远，走过柏树老坟的时候，看到坟场上有数不清的坟堆。一棵弯曲的老白杨，孤零零地站在坟边上，挂着几个黄叶片，摇摇摆摆地发出一种凄凉的声音，引得我浑身发冷。这是穷人的坟地。我看到往这里埋过不少死人，有的用苇席卷着，有的用一对瓷缸对起来，把死人放在里边，都没有用过棺材。我想着这些，脚步迈慢了。父亲回过头来喊：

“走快点儿！”

“喂。”我紧跑两步赶上了父亲。

我和父亲到了爷爷奶奶留下的三亩地里，父亲左看看右

看看，末了把我引到一个高处和我说：“犟巴，你说我们的井口开在哪儿好？”我的两眼珠儿转转，奇怪地回答：“我知道哪儿好？”“你就说吧，你说哪儿好就哪儿好！”我随使用脚指了一下说：“就在脚底下吧！”“噢！”父亲把镢头扔到了我的脚下，又说：“等日头出来再破土，歇歇吧。”

不多一会儿，日头出来了。日头先露出许多红道道儿，好象一朵大红花。我父亲站起来，在我用脚指过的地方划了一个圆圈儿。他跪下了，吩咐我也跪下。让我点着香，烧着纸。纸灰一直飞到了天空里。我父亲恭恭敬敬地叩了一个头，站起来望着天空的纸灰哈哈地笑了。我见父亲笑了，我也叩个头，糊里糊涂地跟着笑了。

我从记事到现在，难看到母亲有笑容，也很少见到父亲这样大笑过，简直就没有看见过。他也总是“门神爷”似的板着脸。不过，他不象母亲一个样，母亲脸红他脸黄。母亲脸上多没笑容我也不害怕，他只要板脸我就怕。

父亲把镢头递给我，说：“犟巴，你来动土。”我不明白父亲为啥先让我来刨头一镢头，说道：“爹，你比我有劲儿！”

“别多说，快刨吧！”我用力地把那老重的镢头抡起来，又用力地刨下去，硬土开花了。父亲望着我露了一下笑脸，把镢头接到了手里，猛劲地刨。到吃饭的时候，就刨下一尺多深了。

我的家乡是山地，打下五、六丈深才能见水。见了水，四边还要砌上平整的石头。运石头要请人，砌石头要请人，上土车水都要请人。请人不出钱，可要管顿好饭。同时还要买绳索，置铁锹，添石锤……等第二年春天把井口砌好，借



来的三百吊铜钱，已经花了个一干二净。

井打成了，我父亲累了个筋干皮裂，他的精神却很旺盛。他和哥哥的汗水不住地流着，滴到了新打成的井里，可还是拚命地摇辘轳。我在田边上看水道，也热得厉害，不时地把冰凉的水浇到脖子里，浇到背上。我们三个人浇麦田，母亲给我们做饭送饭，饭食很不顶饿，黑枣面捏成的饼子，里面掺上不少的干菜叶，本来带些甜味的黑枣面饼子，已经变成苦的了。再苦，再难咽，我和哥哥都不说一句话，因为母亲舍不得吃一口，父亲也勒着肚子让我和哥哥尽量吃。不到太阳落，肚子饿得就口里吐酸水，眼里冒金星。可是不到星星出，我父亲是不让停手的。为啥父亲鼓起这样一股猛劲呢？井是他的心，三亩水地成了他的命。小麦长得可真好啊！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小麦还没有到手，母亲却先被赖去二斗麦。

星星满天以后，我和父亲、哥哥回到了家里。晚饭做熟了，铁洗脸盆里也象往常一样舀下了洗脸水，母亲却不象往常。只见她坐在屋里板凳上，脸色红似火，嘴唇发了紫，嘴角里挂着白唾沫，放在膝盖上的两手直哆嗦。我见过母亲发过多少次火，没有看到这样严重过。我趴到她身边，抓住了她的两只手，喊一声：

“娘——”

母亲看也不看我。

不管人怎说母亲长和短，父亲在打井事上也迷信，可 he 从来对母亲没有小看过。只要母亲脸一红，他的心里也不好过。夜里，我听见他小声和母亲说过多少回：“多穷多苦我也不怕，我就怕你气性大。”这工夫，父亲看到母亲气成这个

样，就凑过来说：

“这是咋啦？”

母亲不回答，猛地往起一站，给我们三个人都盛了饭。

“你呢？”我们三个人都问她。

她还是不回答，又坐到板凳上。父亲给我使个眼色，我赶紧给母亲盛碗饭，放到母亲脸前边，催促母亲吃。母亲连看也不看一眼。这可叫我和哥哥着了急。父亲更着急，他又站到母亲脸前边：

“他娘，你别攥着拳头叫我猜，谁引你犯了病？你给我讲出来，豁着我的命不要了，我也找他说说去！”

“你们都快吃饭吧！”母亲开口了。

“你不端碗，我们谁能吃下去？”父亲说。

“要没有了我，你们就不过啦？”母亲说。

母亲的话也许是无意说出来的，父亲可不把它看轻了。母亲的话刚落音，父亲就握住了拳头说：“他娘，你……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！这个家，没有了谁也不能过！你说说……”

母亲心里的疙瘩象是生铁的，就是一个不说。急得哥哥吃没了下嘴唇，急得我脸上象是冒了火，急得父亲的脸色儿象黄蜡一样黄。忽然有人在院里猛地答了话：

“田二牛，你听着！”答话儿的是刘老春家管事的池仁良。池仁良不等父亲走到院子里就又说：“老春爷爷叫我来对你说，叫你好好管教管教犟巴娘！她说是要到老春爷爷家北边货郎担家去买线补口袋，直接从老春爷爷家门前大路上过。她的眼又不瞎，就是瞎了也该听见老春爷爷家正盖新房。就是不盖新房，老春爷爷也叫我吩咐过她，不准她这

个爱妨克人的女人从老春爷爷门前的大路上走。柿子岭三百来户人家，哪个敢不听老春爷爷的吩咐？老春爷爷说了，为了清除她给人留下的灾邪，要请阴阳先生念阴阳经，念阴阳经的费用由你来出，给出二斗麦！现在没有，收了夏给送去！”

池仁良一口气把话说完，不等父亲说句话，转过身去就走了。

二

池仁良的话，一下让我把母亲生气的谜猜着了。父亲更知道。父亲从院里转回屋里和母亲说：“他娘，你往货郎担家去买线，没有绕着走，从刘老春家门前的路上过去啦？”

母亲含着泪花开口说：“他家门前的路又不是他家的，为甚我就不能走？”

父亲张了张口没说话。

母亲的话没说错，刘老春家门前的一条大路并不是刘老春家自己的。不让母亲走，还要来罚二斗麦，这叫母亲可受不了。眼看着母亲的脸色更红了，嘴唇更紫了，嘴角里的唾沫更多了，哆嗦着的两手攥成了拳头。我和哥哥谁也不愿再看母亲的难看样儿。父亲呢？脸色更难看，象是往肚里咽黄连，又象是往肚里吞钢针。他脸上的青筋全都暴起来，不多的几根黄胡须翘个直，脸上黄豆大的汗水珠往下落，等了老半天，才和母亲慢慢说：

“他娘，这口气受在我这个没本事的人身上吧！收下麦子的工夫，就给他二斗麦。你也看见了，咱的麦子长得好上好，少进家二斗麦子不要紧，只当让老鼠给偷吃了。饭凉了，犟巴，递给你娘饭！”

“喂。”我应着声把母亲的饭碗递到母亲手里，又和母亲

说：“娘，快吃饭。”母亲还是不接饭碗，眼里老落泪水珠。我见母亲老落泪，我哇的一声哭出了声。我一哭，把母亲的心哭活了，她伸手接住了饭碗。还训我一句：“你哭个甚，快吃饭！”

晚上，父亲又劝说了母亲一阵，总算让母亲把气火压住了。母亲把气火压住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学下了个爱往肠肠肚肚上挂事情的习惯，母亲和父亲长出一口气，也爱挂在肠子上，一直到了五月初一，我父亲说要开镰割麦，我才把母亲和父亲的难看样儿撂下了。

五月初一，我们全家来了一个“总动员”：我同哥哥、父亲割麦；母亲赶牲口往场上送麦。父亲到西邻家借扁担去了，我和母亲、哥哥赶着白脖儿小毛驴先到了麦地。我和哥哥望着丰收的麦子，高兴地吵吵起端午节吃什么饭来了。哥哥先放开他的粗嗓门儿：“来顿白面饼。”我说：“不，馍馍好吃。”母亲不说话，我和哥哥争个不休，急得我一蹦爬到了我哥哥背上，要在我哥哥的脖子后头咬一口，我父亲大步地赶来了。他开口就说：“真是没见过颗麦粒儿！”我赶紧从哥哥背上跳下来，猫也似的再也不说什么了。父亲把扁担一扔，背起手向着麦地转开了。我也站起来，象父亲一样背起了手，悄悄地跟随在父亲后边转。父亲望着麦子笑一笑，我也偷偷地笑一笑，直等父亲发现了我，瞪大了他的两眼，我才赶紧把手放下来。

老正爷爷赶着羊来到了我家地旁边，他一看见我爹，就放开嗓门儿喊起来：“好哇二牛！今年可发了财了。到底是打一眼井强啊！我把咱村的麦地都看遍了，谁也没有你的麦子

好！今年端午节可要吃顿好的了吧？”父亲把头一扬，哈哈地笑了个响，说：“噢，吃呀。你也到我那儿吃！”

“吃！”老正爷爷打着响鞭走了。

老正爷爷刚走，吉祥爷爷也向父亲贺喜来了。吉祥爷爷的年纪已近六旬，是我们村最穷最苦的人。晚上，他和火神庙里的火神爷爷做伴，白天帮人干活。他肚量大，干活慢，给人打短工，人不愿用他。他就帮左邻右舍抱抱孩子。抱一天孩子，较好的人家管他一顿饭，差点儿的人家送他些菜吃。地主老财办喜事的时候，他去给人扫扫街，清清道，弄顿饱饭。每逢年初一和端午节，他往各家叫人句爷爷奶奶，向人收敛些吃的和粮食。有时，他也偷人一把庄稼。不过，他从不在柿子岭村里偷，也不偷穷人的。可他的名下总是有个偷字，应该叫他爷爷伯伯的人也叫他的名字，连他的姓也不挂上。孩子们也一样。我开初也喊他名字，有一回叫母亲听见了，母亲在我头上盖了一巴掌，叫我叫吉祥爷爷，我才叫起了吉祥爷爷。父亲也尊敬吉祥爷爷。吉祥爷爷刚走到地边，父亲就和吉祥爷爷答话：

“吉祥叔，看我这麦子怎么样？”

“一百一！”吉祥爷爷露着他那唯一的黄牙齿，回话说。

“打场的时候，你带上口袋去装二升吃！”

“哈哈，够你用的吗？”

“说啥够不够，有我一斗，就有你半升！可记着去装二升啊。”

“去！”他应罢，又和父亲说了两句话就走了。吉祥爷爷是要往东山里收拾他春天开的一片荒。

我家的麦子，谁见了谁也得夸：没有一棵秕穗，没有一棵黑疸，父亲进了麦地只能露个头，我钻进去了没有麦杆高。密的一棵挨一棵，麻雀也飞不进去。一阵风吹过来，麦地里麦浪接麦浪，真是好看又好看。我见父亲高兴，便偷偷地跑到前边藏起来，等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突然从麦垄里钻出来，象野鸡那样狂叫一声，父亲吓得一怔，大步追上了我，伸出他的手指在我的脑瓜上轻轻地弹了一下。

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三亩地里的麦子就全收割到了场上。

五月初三日打场，别说我们一家有多么高兴了。吃过中午饭以后，我牵着白脖儿小毛驴，父亲和哥哥拿着打场的用具。我要不是怕父亲朝我瞪眼，我就要左一步右一步地晃着走。到了场里，找人寻口袋的母亲早先到了。这一天中午火热，热得树叶儿卷成了团儿，小鸟儿们一个也不见了。母亲怕把白脖儿毛驴热坏了，带来了一条破麻袋，提来了一桶凉水，要把破麻袋上倒上凉水，披在白脖儿毛驴的身上。

我母亲为什么这般地疼爱我家的白脖儿毛驴呢？原来我哥哥吃奶的时候，有人送给了我母亲一只刚脱胎的小羊羔，我母亲让我哥哥吃一个奶，让小羊羔吃一个奶，不管我哥哥怎样地躺在地上打滚儿不满意，硬把小羊羔喂成了大羊。大羊是一只母羊，七个月就配了羔。母羊生母羊，三年成了串。我父亲把羊全卖了，买下了这只白脖儿小毛驴。平常，我母亲不顾自己吃喝也要把白脖儿小毛驴的肚子喂鼓了。

父亲象母亲一样的疼爱白脖儿毛驴。碾场开始了，父亲让哥哥转场，他伴着白脖儿毛驴拉石碾。白脖儿毛驴身上披着

浸湿了的破麻袋，父亲却连个能遮阳的破草帽也没戴，脸上背上的汗珠子象下雨似的往下流，我不停地把铁壶里的凉水送给他，他喝一气水，又猛流一阵汗，把身上一条半截破裤子湿得透透的，象刚从水里捞出来。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麦糠扫到一边了，金黄黄饱楞楞的大堆麦粒，堆在麦场的中央。父亲高兴地一声不响地望着麦堆，母亲脸上也露出喜色，真猜不到他们的心是多么高兴啊！

天气不象刚才那样热了，一对红羽小鸟又“喳喳”地飞落到我家场边的槐树枝上，我叫了一声，小鸟没有飞走。我高兴地吐了一下舌头，轻轻地往树上爬起来，想把它捉下来。刚刚爬到树杈上，离小鸟站立的地方没有二尺远了，我正要伸手去捉它，村口“嘎”地响了一声鞭子，小鸟飞走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刘老春家管事的池仁良，提着一个墨黑的大斗，朝我家场上走来，后边紧跟着又来了在刘老春家扛长工的大头目，赶着两头青骡子。

池仁良四十来岁，个子不高，圆楞楞的头顶上没有一根头发。到过煤矿上的说池仁良的头象电灯泡儿，没见过电灯的说象块大红薯。池仁良走路爱眯缝着眼，老正爷爷说他这是老狐狸打盹儿——没安好心。从我记事那天起，我就听大人们说他替刘老春要账，看人下菜碟儿，遇上愣的说好话，碰上软的往人眼里下拳头。他对待刘老春，舌头伸得象高粱叶长，刘老春放个屁，他也说是香的。大人们还常说：“池仁良不是池仁良，池仁良是个吃人狼。”前几年我哭的时候，母亲就说，“看池仁良来啦！”我也就不敢再哭了。自那天，池仁良到家里去传达了刘老春的圣旨，罚了我们二斗麦，叫我想池仁